



马克思 恩格斯 列 宁 斯大林

文艺论著选读

辽宁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

1972.10.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目 录

马克思给斐·拉萨尔的信（1859年4月19日）	1
恩格斯给斐·拉萨尔的信（1859年5月18日）	10
恩格斯给敏·考茨基的信（1885年11月26日）	18
恩格斯给玛·哈克奈斯的信（1888年4月初）	24
恩格斯给保尔·恩斯特的信（1890年6月5日）	30
恩格斯：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摘录）	35
马克思 恩格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4期 上发表的书评 评托马斯·卡莱尔《当代评论》	
(一)当前的时代。(二)模范监狱》1850年伦敦版 (摘录)	51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摘录）	56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摘录）	62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摘录）	65
恩格斯：反杜林论·引论（摘录）	69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摘录）	74
列 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	78
列 宁：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	85
列 宁：列·尼·托尔斯泰	94
列 宁：转变没有开始吗？	101
列 宁：列·尼·托尔斯泰和现代工人运动	104
列 宁：托尔斯泰和无产阶级斗争	108

列 宁：“保留”的英雄们.....	110
列 宁：列·尼·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	118
列 宁：欧仁·鲍狄埃（为纪念他逝世二十五周年而作）.....	124
列 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摘录）.....	128
列宁给阿·马·高尔基的信（1919年7月31日）.....	131
列 宁：青年团的任务（1920年10月2日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说）（摘录）.....	136
列 宁：论无产阶级文化.....	140
斯大林：给阿·马·高尔基的信（1930年1月17日）...	143
斯大林：致杰米扬·别德内依同志（1930年12月12日）（摘自原信）.....	147
编后记.....	154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¹

柏 林

1859年4月19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萨尔：

我没有特地写信告诉你，十四英镑十先令已经收到了，因为来的是挂号信。但是，如果不是该死的“荷兰兄弟”² 拜访我，极残酷地占去了我的剩余劳动时间，那我早就写信了。

现在他已经走了，所以我又自由地呼吸了。

弗里德兰德³ 已经写信给我。条件不如我原先告诉你的那样好，但还“过得去”。解决了在我们之间还有的几个次要问题以后——我想，在这个星期内这就会商妥——我将给他写东西。

在英国这里，阶级斗争的进展是极其令人高兴的。遗憾的是，在这种时候连一家宪章派⁴ 的报纸也不再存在了，所以，差不多两年以来，我不得不停止通过写作参与这个运动。

我现在来谈谈《弗兰茨·冯·济金根》。首先，我应当称赞结构和情节，在这方面，它比任何现代德国剧本都高明。其次，如果完全撇开对这个剧本的纯批判的态度，在我读第一遍的时候，它强烈地感动了我，所以，对于比我更容易激动的读者来说，它将在更大的程度上引起这种效果。这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现在来谈谈缺点的一面：第一，——这纯粹是形式问题

——既然你用韵文写，你就应该把你的韵律安排得更艺术一些。但是，不管职业诗人将会对这种疏忽感到多大的震惊，而总的说来，我却认为它是一个优点，因为我们的专事模仿的诗人们除了形式上的光泽，就再没有别的什么了。**第二**，你所构想的冲突不仅是悲剧性的，而且是使1848—1849年的革命政党必然灭亡的悲剧性的冲突⁵。因此我只能完全赞成把这个冲突当做一部现代悲剧的中心点。但是我问自己：你所选择的主题是否适合于表现这种冲突？巴尔塔扎尔⁶的确可以设想，如果济金根不是借骑士纷争的形式举行叛乱，而是打起反对皇权和公开向诸侯开战的旗帜，他就一定会胜利。但是，我们也可以有这种幻想吗？济金根（而胡登⁷多少和他一样）的覆灭并不是由于他的狡诈⁸。他的覆灭是因为他作为骑士和作为垂死阶级的代表起来反对现存制度，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反对现存制度的新形式。如果从济金根身上除去那些属于个人和他的特殊的教养，天生的才能等等的东西，那末剩下的就只是一个葛兹·冯·伯利欣根⁹了。在后面这个可怜的人物身上，以同样的形式表现出了骑士对皇帝和诸侯所作的悲剧性的反抗，因此，歌德选择他作主人公是正确的。在济金根——甚至胡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虽然对于他，正象对某个阶级的一切思想家一样，这种说法应当有相当的改变——同诸侯作斗争时（他反对皇帝，只是由于皇帝从骑士的皇帝变成诸侯的皇帝），他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唐·吉诃德¹⁰，虽然是被历史认可了的唐·吉诃德。他以骑士纷争的形式发动叛乱，这只是说，他是按骑士的方式¹¹发动叛乱的。如果他以另外的方式发动叛乱，他就必须在一开

始发动的时候就直接诉诸城市和农民，就是说，正好要诉诸

那些本身的发展就等于否定骑士制度的阶级。

因此，如果你不想把这种冲突简单地化为《葛兹·冯·伯利欣根》中所描写的冲突——而你也没有打算这样做，——那末，济金根和胡登就必然要覆灭，因为他们自以为是革命者（对于葛兹就不能这样说），而且他们完全象1830年的**有教养的**波兰贵族一样，一方面使自己变成当代思想的传播者，另一方面又在实际上代表着反动阶级的利益。革命中的这些**贵族代表**——在他们的统一和自由的口号后面一直还隐藏着旧日的帝国和强权的梦想——不应当象在你的剧本中那样占去全部注意力，农民和城市革命分子的代表（特别是农民的代表）倒是应当构成十分重要的积极的背景。这样，你就能够在更高得多的程度上用最朴素的形式把最现代的思想表现出来，可是现在除**宗教自由**以外，实际上，国民的一致就是你的主要思想¹²。这样，你就得更加**莎士比亚化**，而我认为，你的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地**¹³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你自己不是也有些象你的弗兰茨·冯·济金根一样，犯了把路德¹⁴式的骑士反对派看得高于冈采尔¹⁵式的平民反对派这样一种外交错误吗？

其次，我感到遗憾的是，在性格的描写方面看不到什么特出的东西。我是把查理五世、巴尔塔扎尔和理查·冯·特利尔¹⁶除外。然而还有别的时代比十六世纪有更加突出的性格吗？照我看，胡登过多地一味表现“兴高采烈”，这是令人厌倦的。他不也是个聪明人、机灵鬼吗？因此你对他不是很不公平吗？

甚至你的济金根——顺便说一句，他也被描写得太抽象了——是多么苦于不以他的一切个人打算为转移的冲突，

这可以从下面一点看出来：他一方面不得不向他的骑士宣传与城市友好等等，另一方面他自己又乐于在城市中施行强权司法。

在细节的方面，有些地方我必须责备你让人物过多地回忆自己，这是由于你对席勒的偏爱造成的。例如，在第121页上，胡登向玛丽亚叙述他的身世时，如果让玛丽亚把从“感觉的全部音阶”等等一直到“它比岁月的负担更沉重”这些话说出来，那就极为自然了。

前面的诗句，从“人们说”到“年纪老迈”，可以摆在后面，但是“一夜之间处女就变成妇人”这种回忆（虽然这指出玛丽亚不是仅仅知道纯粹抽象的恋爱），是完全多余的；无论如何玛丽亚以回忆自己“年老”来开始，是最不能容许的。在她说了她在“一个”钟头内所叙述的一切以后，她可以用关于她年老的一句话把她的情感一般地表现出来。还有，下面的几行中，“我认为这是权利”（即幸福）这句话使我愤慨。为什么把玛丽亚所说的迄今对于世界持有的天真看法斥为说谎，因而把它变成关于权利的说教呢？也许下次我将更详细地对你说明我的意见。

我认为济金根和查理五世之间的一场是特别成功的，虽然对话有些太象是公堂对质；还有，在特利尔的几场也是成功的。胡登关于剑的格言是非常好的。

这一次已说得够多了。

你的剧本获得了一个热烈的赞赏者，那就是我的妻子。只是她对玛丽亚不满意。

祝好。

你的卡·马·

顺便说一下：恩格斯的《波河与莱茵河》里面有严重的刊误，我在这封信的最后一页上附了一个勘误表。

(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廿九卷
中文版571页—575页)

注 释：

1. 马克思、恩格斯分别给拉萨尔（1825—1864）的两封信，都是批评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的。这两封信在批判拉萨尔的机会主义路线和他的唯心主义文艺理论方面，都极为重要。

拉萨尔是德国工人运动初期的活动家，是暗藏在德国工人运动队伍中的内奸和工贼。他自称是马克思的学生，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凶恶敌人。他极力散布“平等的权利”、“公平的分配”等机会主义滥调，妄图欺骗无产阶级放弃革命斗争，把无产阶级革命引上改良主义的邪路，以达到保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写这两封信的时候，在整个工人运动中，还未发展到对拉萨尔机会主义路线的公开批判；但就在这两封信中已经开始对拉萨尔的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在以后的《哥达纲领批判》中对拉萨尔的错误路线进行了彻底清算。

《弗兰茨·冯·济金根》是拉萨尔在1858年至1859年写成的历史剧。历史上的弗兰茨·冯·济金根（1481—1523）是德国骑士，是十五、六世纪封建小骑士的代表。他不惯于日益发展的货币经济的条件而以抢夺劫掠来维持自己的物质生活。1522年在莱茵河上游建立了骑士联合会，济金根是首领。这些属于低级贵族的骑士发动了反诸侯（即封建领主）的起义，他们不是为了反封建制度，而是想取代诸侯的权利。他带领一万五千人的队伍去进攻特里尔大主教的领地，终于失败而被杀。

拉萨尔从他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出发，在剧本中把济金根这个人物理想化了。他认为济金根作为一个领袖，必然遇到“革命目的”和“革命手段”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在他看来，济金根之所以失败，是在于没有公开打出反对皇帝和封建诸侯的旗帜，而是以所谓骑士内争为借口发动武装暴动的。这是一种“策略”，一种“外交手段”的错误。它导致既不能欺骗敌人，又完全脱离

了群众，终于得到悲剧的下场。拉萨尔写这个剧的目的，在于说明十五世纪在济金根身上的悲剧又在十九世纪的德国资产阶级革命中重演。当时，德国资产阶级害怕无产阶级，它和反动封建贵族结成同盟，背叛了人民，导致革命失败。而拉萨尔却把资产阶级的叛变解释成是“策略”上的错误，这完全是为资产阶级的叛变作辩护的。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这种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指出：“他（指济金根）的复灭是因为他作为骑士和作为垂死阶级的代表起来反对现存制度，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反对现存制度的新形式。”济金根的悲剧就在于他自以为是革命者，而实际上则代表着反动的阶级；他如果要发动一个反抗封建诸侯的真正有力的斗争，那就必须联合城市和农民，特别是农民，但是他自己的骑士阶级的地位决定他不会这样做的。拉萨尔甚至把济金根这样的下层贵族当作那时革命的代表，而污蔑农民是“清一色的反动的群众”。针对这个荒谬观点，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作品中农民和城市革命分子的代表，特别是农民倒应当成为十分重要的积极的背景，这样才能“在更高的程度上用最朴素的形式把最现代的思想表现出来”。马克思、恩格斯都是从无产阶级革命利益出发批评这个作品的；在对这个作品的批评时，对一系列的政治和文艺问题作了阐明。

2. 是指马克思妹妹路易莎的丈夫扬·卡尔尤达。
3. 弗里德兰德，麦克斯（1829—1872）拉萨尔的表弟，维也纳《新闻报》的编辑。他曾请马克思给《新闻报》写文章。
4. 伦敦工人协会宣布要以各种合法手段革除统治阶级剥夺人民自由权利的各种反动立法，改善工人生活条件，使社会一切阶级都获得平等地位，并于1837年6月草拟了以争取普选权为基本要求的“人民宪章”向国会请愿。这个运动就叫“宪章运动”。参加这个运动的那些人就叫“宪章派”。这个运动标志着英国无产阶级已经走上政治斗争的舞台。
5. 悲剧，戏剧的一种形式。悲剧性的冲突，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是由“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所构成的。它总是表现主人公为着崇高目的而斗争所做出的牺牲以及崇高的事物遭到毁灭。1848—1849年的革命，是指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时在工人、农民的参加下，几乎整个欧洲燃起了革命火焰。而这时因资产阶级害怕工人、农民的觉悟，转向反革命，致使革命失败。当时的反对封建势力的人民革命，即以城市革

命分子、农民为代表的广大群众和封建势力的冲突，马克思称之为“一部现代悲剧的中心点”。马克思接着批评拉萨尔没有正确表现了这个冲突。

6. 巴塔扎尔是《弗兰茨·冯·济金根》里的人物。剧本结尾时，巴塔扎尔对济金根说：

“哦‘你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末个
在大事情上要狡猾而送掉性命的人’
在历史的市场上，化装行不通，
在那混乱的市场里人民只根据
甲胄和徽章来辨认你。
经常大胆地把你的全身
都染上你的旗帜的色彩吧，
然后你在巨大的斗争中考验我们，
你的真正基础的整个行动力，
拿出你的全部能力挺立和战死。”

这是剧中人物的话，实质上完全是拉萨尔的观点。

7. 胡登，乌里希·冯（1488—1523）是一个出身于贫苦骑士家庭的人道主义者，罗马教会的激烈反对者。他曾参加路德的宗教改革，又参加了骑士的叛乱。他是济金根的顾问和朋友。

8. 拉萨尔在剧本中这样描写的：济金根进军之前，邀集一些贵族集团，但没有把他的目的，即想最后夺取王冠告诉他们，仅用他的手段，即凭三寸不烂之舌，使这些人落入他的圈套，同他订了约。他认为这样就胜利在握，不料最后这些贵族集团背约而使济金根死于乱军之中。拉萨尔的机会主义观点认为，任何领袖的政治目的与狡诈手段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能解决的，这最终将导致领导者的灭亡的悲剧。拉萨尔的这个观点，实质上是为在1848—1849年革命中资产阶级的叛变辩护的。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济金根灭亡的阶级根源：因为他是“垂死阶级的代表”。

9. 葛兹·冯·白里兴根，见《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注释⁸。歌德是这样处理的：他把白里兴根写成一个和诸侯作战，反封建、争取自由的英雄，反映了当时的狂飚突进运动的反抗精神，表达了法国资产阶级青年一代的革命情绪。恩格斯说这部作品是“通过戏剧的形式向一个叛逆者表示哀悼和敬意”。

10. 这是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长篇小说《唐·吉诃德》中的主人公。他想恢复过时的骑士制度，把骑士单枪匹马打抱不平的方式

当作改造社会的途径，结果撞得头破血流。作者用了极其幽默的笔调有力地讽刺他按骑士的法则行事，疯疯痴痴，滑稽可笑。

11. 十六世纪的德国是等级庞杂、诸侯割据的局面。当时的等级有诸侯（即封建领主）一般贵族、僧侣、城市贵族、市民和农民。骑士属于低级贵族。当时诸侯割据使国家四分五裂，而要使国家统一，必须消灭诸侯。济金根等骑士也想消灭诸侯，其目的仅仅是想建立统一的封建帝国，使他们的阶层重新回到二百年前的显赫地位。所以说“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唐·吉诃德”。
12. 这个剧本中的济金根，是作为一个有重新统一德国的伟大理想的人物出现的。他认为帝国没落、诸侯称霸的根本原因，是皇帝没有很好地掌握基督教，使它变为“伟大的国民和国家的观点”。所以，所谓宗教自由，就是指对基督教进行改良。所谓国民的一致，是自上而下的受基督教控制的封建王朝的统一。
13. 席勒（1759—1805）德国诗人、戏剧家。“席勒式”或“席勒化”，是指他的戏剧理论和创作中的一种错误倾向。他认为应该通过所谓理想的人性来建立理想的社会，而戏剧就是使人性理想化的手段。所以，他有时把作品主人公当作自己道德理想的宣传者或完美无缺的人性的化身。这样，使作品违背生活真实而成为作者的抽象的说教。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前后，德国有的黑格尔派唯心主义哲学家，为了宣扬从抽象的哲学体系出发来“认识世界”的唯心主义观点，在文艺上，竭力鼓吹席勒化，而贬低莎士比亚。他们攻击莎士比亚的作品对社会生活的如实描绘的方面，甚至认为莎士比亚不能象席勒曾经主张的那样将哲学体系放入文艺作品中，所以不能成为真正的诗人。马克思、恩格斯曾对这种创作倾向进行坚决斗争。拉萨尔的这个剧本也是当时这种唯心主义思潮的产物。他的主人公的命运成为演绎作者自己的所谓“悲剧概念”的单纯的传声筒。
14. 路德，马丁（1483—1546）是德国宗教改革的领袖，一个萨克逊矿工之子。起初，他出来坚决反对教皇、诸侯、贵族及商人，他号召农民起来进行真正的革命。但很快地他就叛变了农民的利益，而出来保护贵族及诸侯的政权。这里所谓“路德式的骑士”，正如列宁所指出的，用二十世纪俄国的名词即现代术语来说，就是“自由派的地主”。
15. 阁采尔，托马斯（1489?—1525）是十六世纪领导农民工人起来反抗诸侯贵族的一个领袖，起初为教士，与路德相接近，坚决地

出来反对教皇的权利，当路德转到反革命之后，闵采尔却领导八千未经军事训练的农民，以对敌九千有极好训练和武装的三个诸侯的军队，结果为敌人所虏并被杀死。闵采尔不但主张打倒封建贵族，而且主张消灭私有财产，实行财产公有，但是他认为要做到这点，只有依靠万能的信仰，这是他学说中唯心主义的空想。恩格斯称他为“革命的平民”。这里所谓“平民闵采尔”，也正如列宁所指出的，用现代术语来说，就是“无产阶级的农民”。

16. 卡尔第五和理查·冯·特利尔都是《弗兰茨·冯·济金根》里的人物。

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

柏 林

1859年5月18日于曼彻斯特
特隆克利夫小林坊6号

亲爱的拉萨尔：

我这样久没有写信给您，特别是我还没有把我对您的《济金根》的评价告诉您，您一定觉得有些奇怪吧。但是这正是我延迟了这样久才写信的原因。由于现在到处都缺乏美的文学，我难得读到这类的作品，而且我几年来都没有这样读这类作品：在读了之后提出详细的评价：明确的意见。没有价值的东西是不值得这样费力的。甚至我间或还读一读的几本比较好的英国小说，例如萨克雷¹ 的小说，尽管有其不可辩驳的文学和文化历史的意义，也从来没有能够引起我的这样的兴趣。但是我的判断能力，由于这样久没有运用，已经变得很迟钝了，所以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我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是和那些东西相比，您的《济金根》是值得另眼看待的，所以我对它不吝惜时间。第一二次读您这部从题材上看，从处理上看都是德国民族的戏剧，使我在情绪上这样地激动，以致我不得不把它搁一些时候，特别是因为在这个贫乏的时期里，我的鉴赏力迟钝到了这样的地步（虽然惭愧，我还是不得不说）：有时甚至很少有价值的东西，在我第一次读时也不会不给我留下一些印象。为了有一个完全公正、完全“批判的”态度，所以我把《济金根》往后放了一放，

就是说，把它借给了几个相识的人（这里还有几个多少有些文学修养的德国人）。但是，“书有自己的命运”——如果把它们借出去了，就很少能再看到它们，所以我不得不用暴力把我的《济金根》夺了回来。我可以告诉您，在读第三遍和第四遍的时候，印象仍旧是一样的，并且深知您的《济金根》经得住批评，所以我现在就把我的意见告诉您。

当我说任何一个现代的德国官方诗人都远远不能写出这样一个剧本时，我知道我对您并没有作过分的恭维。同时，这正好是事实，而且是我们文学中非常突出的，因而不能不谈论的一个事实。如果首先谈形式的话，那末，情节的巧妙的安排和剧本的从头到尾的戏剧性使我惊叹不已。在韵律方面您确实给了自己一些自由，这给读时带来的麻烦比给上演时带来的麻烦还要大。我很想读一读舞台脚本，就眼前的这个剧本看来，它肯定是不能上演的。我这里来了一个德国青年诗人（卡尔·济贝尔²），他是我的同乡和远亲，在戏剧方面做过相当多的工作；他作为普鲁士近卫军的后备兵也许要到柏林去，那时我也许冒昧叫他带给您几行字。他对您的剧本评价很高，但是认为，由于道白很长，根本不能上演，在作这些长道白时，只有一个演员作戏，其余的人为了不致作为不讲话的配角尽站在那里，只好三番两次地尽量做各种表情。最后两幕充分证明，您能够轻易地把对话写得生动活泼，我觉得，除了几场以外（这是每个剧本都有的情况），这在前三幕里也是能做到的，所以我毫不怀疑，您在为这个剧本上演加工的时候会考虑到这一点。当然，思想内容必然因此受损失，但是这是不可避免的。而您不无根据地认为德国戏剧具有的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

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大概只有在将来才能达到，而且也许根本不是由德国人来达到的。无论如何，我认为这种融合正是戏剧的未来。您的《济金根》完全是在正路上；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但是还应该改进的就是要更多地通过剧情本身的进程使这些动机生动地、积极地、也就是说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而相反地，要使那些论证性的辩论（不过，我很高兴在这些辩论中又看到了您曾经在陪审法庭和民众大会上表现出来的老练的雄辩才能）逐渐成为不必要的东西。您自己似乎也承认这个标准是区分舞台剧和文学剧的界限；我相信，在这个意义上《济金根》是能够变成一个舞台剧的，即使确实有困难（因为达到完美的确绝不是简单的事）。与此相关的是人物的性格描绘。您完全正确地反对了现在流行的恶劣的个性化，这种个性化总而言之是一种纯粹低贱的自作聪明，并且是垂死的模仿文学的一个本质的标记。此外，我觉得一个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现在他做什么，而且表现在他怎样做；从这方面看来，我相信，如果把各个人物用更加对立的方式彼此区别得更加鲜明些，剧本的思想内容是不会受到损害的。古代人的性格描绘在今天是不再够用了，而在这里，我认为您原可以毫无害处地稍微多注意莎士比亚在戏剧发展史上的意义。然而这些都是次要的事情，我提到它们仅仅是为了使您看到，我在您的剧本的形式方面也用过一些心思而已。

至于谈到历史内容，那末您以鲜明的笔调和对以后的发展的正确提示描述了您最关心的当时的运动的两个方面：

济金根所代表的贵族的国民运动和人道主义理论运动及其在神学和教会领域中的进一步发展，即宗教改革。在这里我最喜欢济金根和皇帝之间，教皇使节和特利尔大主教之间的几场戏（在这里，您把世俗的受过美学和古典文学教育的、在政治上和理论上有远见的使节同目光短浅的德国僧侣中诸侯加以对比，从而成功地直接根据这两个人物的**有代表性的**性格作出了卓越的个性刻画）；在济金根和查理的那场戏中对性格的描绘也是很动人的。您对胡登的自传（您公正地承认它的**内容**是本质的东西）的确采取了一种令人失望的做法，您把这种内容放到剧本中去了。第五幕里的巴尔塔扎尔和弗兰茨的对话也非常重要，在这段对话里前者向自己的主人说明他应当遵循的**真正革命的政策**。在这里，真正悲剧的因素出现了；而且正是由于这种意义，我认为在第三幕里应当对这方面更强调一些，在那里是有很多机会这样做的。但是，我现在又回到次要问题上来了。——那个时期的城市和诸侯的态度在许多场合都是描写得非常清楚的，因此那时的运动中的所谓**官方分子**差不多被您描写得淋漓尽致了。但是，我认为对非官方的平民分子和农民分子，以及他们的随之而来的理论上的代表人物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农民运动象贵族运动一样，也是一种国民运动，也是反对诸侯的运动，遭到了失败的农民运动的那种斗争的巨大规模，与抛弃了济金根的贵族甘心扮演宫廷侍臣的历史角色的那种轻率举动，正是一个鲜明的对照。因此，在我看来；即使就您对戏剧的观点（您大概已经知道，“您的观点在我看来是非常抽象而又不够现实的”而言，农民运动也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那个有约斯³·弗里茨出现的农民场面的确有它的独到之处，而且这